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形成及解读^{*}

段江丽

提 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观念有一个产生、发展、嬗变的过程,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孝道观的具体内涵及意义并不完全一样。先秦时期,关于孝的论述并非儒家的发明和专利,却以儒家孝道思想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即使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对孝的论述也同中有异。为了对传统孝观念进行有效的反思和弘扬,有必要返本溯源,对以孔子、曾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孝道观的渊源、内涵进行细致的梳理。

关键词 先秦 孝道 孔子 曾子 孟子

中国传统孝道观有一个产生、发展、嬗变的过程,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孝道观的具体内涵及意义并不完全一样。先秦时期,关于孝的论述并非儒家的发明和专利,却以儒家孝道思想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即使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对孝的论述也同中有异。为了对传统孝观念进行有效的反思和弘扬,本文拟返本溯源,对以孔子、曾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孝道观的渊源、内涵进行细致的梳理与解读,以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该课题的研究。

一 孝道观缘起

有学者认为,孝道观念是伴随着父系制家庭而产生的,^①或许还需要更周延的论证。另有学者认为,中国与有些原始族群不同,没有食杀父母的习俗,相反,在上古传说或记载中,已有养老爱幼的观念。^②《左传·文公十八年》说,舜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否真实,惜已渺不可考。不过,根据《尚书·尧典》的记载,舜被“四岳”推荐的理由即是“以孝蒸蒸”。另一方面,四代礼制中一个不变的传统就是“养老”“尚齿”,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有着极为深远的根源。

根据《礼记·礼运篇》的描述,夏禹之后,社会性质由原始公有制转入私有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也就是说,禹汤文武等人都是尊“礼”的君子,“礼”的具体内容则包括君

^{*} 本文属于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的阶段性成果。

① 曾振宇、齐金江《中华伦理范畴——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② 康学伟《先秦孝道研究》,北京:天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伦理规范,而父子伦理中自然包含了孝道观念。

根据现存文献和地下发掘的材料,商代后期已经有了宗族观念和制度;西周则在商代宗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在内的体系完整、等级严格的宗法制。^①作为维护宗法秩序的关键纽带,孝道观念自然是商周礼乐文明的重中之重。

春秋时代,随着社会的变动,宗法政治逐渐解体。在这种历史情境之中,西周以来的礼文化发生了一种由“礼”向“义”的转变,从礼仪、礼乐到礼义、礼政的变化,强调礼作为政治秩序原则的意义。“礼”因此也越来越政治化、原则化、价值化、伦理化。^②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代德行体系得到充分发展和讨论。陈来先生曾《逸周书》、《国语》等典籍中涉及的相关德目分为四类:性情之德,包括齐、圣、广、渊、宽、肃、明、允;道德之德,包括仁、义、勇、让、固、信、礼;伦理之德,包括孝、慈、悌、敬、爱、友、忠;理智之德,包括智、咨、询、度、谏、谋。四者之中,性情之德主要指个人的心理状态,道德之德为相对比较个人的道德品格,理智之德偏重处理实际事务的智能,伦理之德则与人际关系最为密切。^③

从商周发展到春秋后期,在伦理之德的问题上已经有了大致稳定的认识,鲁昭公时晏子与齐侯论齐国礼政一段颇具代表性意义:“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这里提出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婆媳五组相互对应的关系中,后四组都是家族间的亲属伦理。而且在宗法—政治合一的体制中,君臣伦理也在相当程度上包含了亲属伦理。在家族伦理中,孝作为保障宗法秩序的基石,有着特殊的意义。《逸周书·宝典解》将其列为“九德”之首:“孝、悌、慈惠、忠恕、中正、恭逊、宽弘、温直、兼武。”《国语·周语下》载,单襄公说“孝,文之本也。”这里“文”乃德行之总名,即孝乃一切德行的根本。《左传·文公二年》亦载,“孝,礼之始也。”

总之,至少在商周春秋时期,中华文明中已经有了明确的孝道观念。至于有关孝道的伦理事实以及伦理观念,可以通过《尚书》、《诗经》、《左传》等早期典籍有所了解。

首先,顺从父母、曲意承欢。《尚书·尧典》^④篇云:“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蒸蒸,乂不格奸。”四方诸侯之长向尧推荐瞽叟的儿子舜时说,他的父亲不义、后母不慈、弟弟象不恭,舜都能与他们和谐相处,这样孝心美厚的人治理国家一定没有问题。^⑤舜作为孝悌典范,其孝行主要表现为对顽父嚚母的逆来顺受。更有甚者,晋太子申生甚至为了让父亲安乐而选择含冤自杀。(《左传·僖公四年》)

其次,勤事、赡养父母。《尚书·酒诰》篇云:“小子惟一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

①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②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4—214页。

③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第289页。

④ 《尚书》中涉及孝行孝道的篇目有《尧典》、《太甲中》、《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无逸》、《蔡仲之命》、《君陈》等,其中,《太甲中》、《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陈》等一般认为是伪书,我们暂且存而不论,只引其他四篇为据。

⑤ 本文对《尚书》的理解主要参看周秉钧译注本,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版。

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费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酒诰是周公命令康叔在卫国宣布禁酒的诰词,诰词中将饮酒作为奉事、赡养父母的奖赏。

其三,守丧三年。《尚书·无逸》篇云:“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无逸》篇是周公告诫成王的诰词,强调人君不可沉迷享乐,必须先知稼穡的艰难和小民的痛苦。将该篇与孝道联系起来,牵涉到对“亮阴”的理解。“亮阴”,《尚书大传》作“梁暗”,《礼记·丧服四制》作“谅暗”,郑玄注:“谅暗转作梁暗,楣为之梁,暗谓庐也;小乙崩,武丁立,忧丧三年之礼。居,倚庐柱楣,不言政事。”高宗即殷王小乙的儿子武丁。也就是说,小乙去世,其子武丁守丧三年。该篇第一段云:“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康诰》篇强调“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为“不孝”之举,这里说作儿子的不知父母稼穡之艰难反而轻慢取笑父母,当然也是不孝的行为,所以,接下来举历史上贤王高宗守丧三年的例子,作为“孝”的典型,合乎逻辑情理。因此,联系上下文,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据《论语·宪问》的记载,孔子认为,守丧三年是古已有之的礼制。《孟子·滕文公上》亦云:“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至于“守丧三年”的明确记载目前所见最早的资料为《左传》,“昭公十一年”、“昭公十五年”皆明确有“三年之丧”语。

其四,不孝论罪当罚。《尚书·康诰》篇云:

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文王作罚,刑兹无赦。

《康诰》是周公告诫康叔治理殷民的诰词。周公强调,不孝不友属于不能赦免的大恶,应该受到刑法的惩罚。

此外,我们在《诗经》中能够读到大量歌颂孝道、感念父母之恩、孝享祖先的诗句。如《小雅·蓼莪》反复咏叹父母养育之恩以及孝子不得终养的憾恨:“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民莫不穀,我独何害”;“民莫不穀,我独不卒!”此诗被方玉润《诗经原始》称为“千古孝思绝作。”千古之下,犹能引发为人子女者强烈的情感共鸣。

值得指出的是,商周文明的突出特点就是宗族组织与政治权力高度同构,尤其是西周封邦建国之后,周天子既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又是统治天下的“天子”,大小诸侯“孝”于宗室也就是“忠”于天子,因此,西周时期的“孝”还涵盖了“忠”,呈现出“忠孝合一”的观念。^①直到春秋时期宗法制破坏之后,异族君臣关系发展起来,“忠”才从“孝”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德目。^②

综上所述,中国原始文明中即有“养老”、“尚齿”的传统;在典籍记载中,舜即以孝行著称;自商周至春秋时期,祭祀、守丧等孝行以及敬亲顺亲、事亲养亲、敬祖报本等孝道观念已经流行于社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诸子对孝多有论述。如《庄子》外篇《天地》

① 曾振宇、齐金江《中华伦理范畴——孝》,第27页。

②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269页;曾广开《先秦忠君观念的形成与解读》,《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第4期。

云“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臣、子之盛也。”此以孝子、忠臣并论,并以不阿谀奉承为孝子、忠臣的最好表现。《墨子》卷四云:“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在墨子看来,天下之治的关键在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彼此相爱,而孝正是臣、子对君、父的爱。《韩非子》第十五《亡征》云:“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顾社稷之利,而听主母之令,女子用国,刑余用事者,可亡也。”韩非子不仅将孝分为“人主之孝”与“匹夫之孝”,而且将“慕匹夫之孝”视为“可亡”的因素之一。先秦儒家之外诸家关于孝的论述是一值得专门讨论的课题。这里只是强调:先秦时期关于孝的论述并非儒家的发明和专利,先秦儒家的孝道观只是诸家中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家,而且有清晰的文化渊源可循。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以孔子、曾子、孟子为代表,考察、分析先秦儒家孝道观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多元性内涵。

二 孔子的孝道思想

考察孔子(前551—前479)孝道思想,最直接可靠的材料是《论语》中孔子的相关言论;同时可以参考《礼记》中所记孔子言论。首先,孔子把孝作为人的基本品德之一,而且认为孝悌一体、忠孝相通。《论语·学而》载: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认为,少年子弟在家要孝顺父母,外出要尊敬兄长,凡事谨慎小心而且讲究信用,广泛爱护他人而且亲近有仁德的人,在此基础上还有余力则用来学习文化知识。可见,在孔子看来,做人是第一位的,做学问是第二位的。而做人的基本品德就是孝、悌、谨、信、爱等。再,《论语·子路》载: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孔子认为第一等“士”是能用羞耻之心约束自己的行为、出使外国能不辜负君主委托的人;第二等“士”是族人称赞其孝、乡人称赞其悌的人;第三等“士”是讲诚信、行动果断的人。说到底,对于没有机会“使于四方”的普通“士”来说,最重要的德行还是孝悌。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在孔子看来,真正的“士”,在家能孝悌,在国能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孝忠相通。事实上,孔子的确将宣扬孝悌看作“为政”之道,体现了忠孝相通的观念。《论语·为政》载: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以为政,奚其为为政?”

孔子认为,把孝悌精神推广、影响到政治上去,这就是参与政治,并不是一定要当官才算参与政治。正因为如此,当季康子问治民之道时,孔子回答:“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即你对待老百姓态度庄重,他们就会恭敬;你孝顺父母、慈爱百姓,他们就会忠诚。这里有两层互相关联的重要含义:第一,领导者应该以身作则,才能教化百姓;第二,领导者本身的孝慈之德能够导引出老百姓的忠诚之德,可谓忠孝相通。

其次,孔子认为“孝”不只是阶段性行为,而是应该贯穿父母生前身后,包括养生送死

以及祭祀亡灵。《论语·为政》载: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孔子认为,“孝”就是“无违”,即不违背关于孝道的种种礼节,具体来说,

父母在世,要按礼节侍奉;父母去世,要按礼节安葬,安葬之后还要按礼节祭祀,这种慎终追远的观念后来成为中国传统孝道思想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在《论语·学而》、《论语·为政》、《论语·子张》等篇目中,孔子还指出,父母身后之孝,不仅止于祭祀,还应该遵循父之遗志。

第三,孔子认为,孝分不同层次,包括事务性的事亲、养亲以及精神性的爱亲、敬亲等,相比之下,后者高于前者。《论语·里仁》载: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父母在世,孝子不能远离家乡,如果一定要外出,要有一定的去处或者理由。^①强调“父母在不远游”的目的是为了侍奉父母以尽孝道。不过,在孔子看来,只是事亲、养亲,还称不上真正的孝,或者说只是低层次的孝,真正的孝要有发自内心的爱敬。《论语·为政》载: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孔子指出,一般人以为在物质上供养父母就可以了。如果只是这样,就是狗马等动物也能得到饲养,因此,作为子女,如果对父母没有发自内心的敬爱之意,那供养父母就和饲养动物没有区别了。孔子还进一步论述了“敬”的具体含义,特别强调要容色恭敬、体贴入微。《论语·为政》载: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关于“色难”历来解读不一,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以东汉包咸《论语章句》所说为代表“色难,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一种以东汉郑玄《论语注》所说为代表“和颜悦色,是为难也。”二者均将“难”解释为“困难”。今人裴传永先生则另出新说,解“难”为“慤”的假借字,至于“慤”的含义,《说文·心部》说“慤,敬也。”《字汇·心部》说“慤,恭也。”《汉语大字典》释“慤”为恭敬。因此,“色难”即“色慤”,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侍奉父母,做到容色恭敬是最重要的。^②这种解释很有道理。接下来,孔子以反诘的口吻说强调,有事情儿女替父母效劳、有酒食让父母先吃还不算孝,亦即真正的孝要有发自内心的恭敬。《荀子·子道》载:

子路问于孔子曰:“有人于此,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然而无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也?辞不逊与?色不顺与?”

根据这一记载,不光是孔子,当时社会比较普遍以“敬”为孝的标准,一个人在父母面前如果言辞不谦逊、容色不恭顺,哪怕事亲再勤,也无孝名。《礼记·坊记》亦记载了孔子类似的说法,“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孔子认为,君子之孝与小人之孝的区别就在于敬与不敬;父亲和儿子不能处于尊卑相同的位置,

① 张诒三《“游必有方”和“粪土之墙”正解》,《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2期。

② 裴传永《〈论语〉“色难”新解》,《孔子研究》2000年第4期。

就是为了强调敬重父亲的威严。《礼记·檀弓下》载,“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为孝。’”孔子说,哪怕粗茶淡饭,只要能让父母欢心,这就是孝。

除了容色恭顺、言辞谦逊之外,对父母的“敬”还体现在一些生活细节上。《论语·里仁》载: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作儿女的,要记住父母的年岁,一则为其长寿而高兴,一则为其年老体衰而担忧。《论语·为政》载: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关于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将“其”理解为孝子,整句话意思是说,孝子的言行不违背礼节,可以使父母放心,父母只需要为他的疾病担忧;另一种将“其”理解为父母,整句话意思是说,孝子要特别为父母的疾病担忧。^①我们从第一种解释。《礼记》以及《孟子》中都有守身为孝的思想。《礼记·祭义》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孟子·离娄上》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闻之也。”孔子强调为了不让父母担忧而守礼,可视为“守身为孝”观念的萌芽。

《礼记·坊记》载:

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

子云:“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于父之执,可以乘其车,不可以衣其衣。

君子以广孝也。”

子云:“父母在,不称老。言孝不言慈。闺门之内,戏而不叹。”

也就是说,有善行则归功于父母,有过错则归咎于自己;要忘掉父母的过错,敬重父母的美德;要与父母同辈的人和睦相处,不能穿父亲同辈人的衣服,总之,要把对父亲的尊重推广到父亲的同辈;父母健在,作儿子的不应该称老,只能谈对父母的孝敬而不能要求父母对自己的慈爱。同时,家庭之内,在父母面前,应该以游戏(使之愉悦),而不应该唉声叹气(使之担忧)。

第四,孔子明确提出了谏亲思想。春秋时期,已经有了谏君观念。《国语·晋语九》载赵简子与其臣属史黯的对话:

简子曰:“良臣,人之所愿也,又何问焉?”对曰:“臣以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择才而荐之,朝夕诵善败而纳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顺,勤之以力,致之以死。听则进,否则退。”

这里,史黯明确强调臣子应该具有举贤、谏过、不听则退等重要德行和规范。赵简子与孔子为同时代人,孔子亦非常赞同良臣谏君的思想。《论语·微子》载: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论语·宪问》载: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① 参看唐满先译注《论语译注》,见夏延章、唐满先、刘方元《四书今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

殷纣王无道,微子离开了他,箕子做了他的奴隶,比干力谏而被杀害。孔子称赞他们是殷朝的三位仁人,可见孔子赞赏比干的谏君之举。子路问事君之道,孔子回答说,对君主不能暗中欺骗,但是可以当面规劝。与谏君思想一致,孔子还明确提出了谏亲思想。《论语·里仁》载: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

这里明确提出如果父母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子女应该委婉地加以规劝;不过,如果父母不听,子女不能怨怪,而仍然要恭敬无违。同样的说法亦载于《礼记·坊记》:“子云:‘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据此,对于父母的过错,孔子的态度非常明确:盲目地从父,不能算孝,真正的孝应该是要弄清楚原由再“从”,也就是说,父义则从,父不义则要做“争子”。《孝经》卷十五记载了类似的一段话,不过交谈的对象是孔子与曾子。

在大致梳理了孔子的孝道思想之后,我们再来讨论曾子与孟子等儒家后学对孔子孝道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三 曾子的孝道思想

作为孔子的嫡传弟子,曾子(前505—前436)直接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孝道思想,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曾子,名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曾子作《孝经》之说一般认为不能成立。^①至于说曾子因为能通孝道而成为孔子的门徒则应可信,在《韩诗外传》卷八、《孔子家语·六本》以及《说苑·建本》等传世文献中有诸多关于曾子孝行的记载;民间广泛传播的二十四孝第三则“啮指痛心”说的就是曾子孝母的故事,由此可见曾子的孝子形象深入人心。

了解曾子的思想,最可靠的材料是《论语》中的曾子之语和《大戴礼》中的曾子十篇。《论语·子张》中有两条曾子转述孔子关于孝道的论述已见上文,这里主要以《大戴礼》中的“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等篇章为主要依据,适当参考其它资料,讨论曾子的孝道思想。

曾子在全面继承孔子孝道思想的基础上,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与孔子相比,曾子更加强调孝德的包涵性及终极性意义。《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云:

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乎身,敢不敬乎?

曾子认为,人的躯体及生命是父母躯体和生命的遗留和延续,因此要谨慎以待,只有做到庄、忠、敬、信、勇才算是孝;做不到这五点、惹祸上身,就是对父母不孝。也就是说,居处庄、事君忠、莅官敬、朋友信、战陈勇,种种美德,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孝。在此基础上,曾子进一步指出,孝德乃通行天下、充塞天地、穿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性法则“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

^① 段江丽《从家庭伦理到政治伦理——〈孝经〉在儒家孝道思想史上的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第3期

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由此可见,在曾子看来,孝德具有广泛的包涵性以及终极性意义。如果说孔子将孝作为基本品德之一,那么,曾子则将孝作为最根本的品德,孝是总目,其它德目包括忠都是从属于孝的子目。在具体论述中,曾子明确将父君与子臣直接对应,强调父子、君臣的同构关系,进一步强化了忠孝相通观念。“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从政者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关于父子、兄弟、君臣关系有更具体的论述,一则强调在父子、兄弟、君臣三组关系中,后者要主动尽责;再则将畜子与孝父、顺弟与承兄、使臣与事君并列,要求父子兄弟君臣应该各自明晓、恪守自己的角色所应遵从的道义,强调双向互动关系。

其次,在孔子养敬有别、孝分层次的基础上,曾子明确将孝从高到低依次区分为尊亲、不辱亲、能养亲三个等级,并且强调孝的基础是爱与敬。《曾子大孝》载: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

曾子认为,第一等的孝是尊重父母;第二等的孝是不使父母受辱,第三等的孝是赡养父母。参照历代注疏,^①三等之孝的划分还与阶层等级相关,即不同等级的孝道分别对应不同的阶层。所以,曾子在对弟子公明仪就孝的具体含义做了一番详细的说明之后,接下来又说:

孝有三: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

清汪照引方氏恂言曰:“用力则能养矣,用劳则弗辱矣,不匮则可以尊亲矣。”清王聘珍、孔广森等人认为这里的三等孝之说“兼言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孝”,即大孝、中孝、小孝分别指“王者之孝”、“(诸侯)大夫士之孝”以及“庶人之孝”。具体说,德泽普施于天下,使天下万物丰盛,以此来祭奠父母,无所欠缺,永无匮乏,这是上等的孝道,是王者之孝。能尊尚仁德,安然地按照正道行事,建功立业,为父母争光,这是中等的孝道,是大夫士之孝。能感念父母的慈爱、忘掉自己的劳苦,而尽力供养父母,这是庶民之孝。《曾子本孝》亦有类似说法“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此段句读、诠释多有歧见,在此不赘。站在本文的立场,主要强调将孝道区分为“君子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这一事实。

简言之,曾子将孝分大、中、小三等,其标准分别是“尊亲”、“不辱”亲、“能养”亲。概括来看,曾子关于孝道的众多论说正是对这三个标准的反复申述。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曾子根据儒家伦理秩序将孝道做了等级化的区分,但是,他在具体论述孝道原则时并未拘泥于身份等级而是从普泛性角度着眼。

第三,具体来说,曾子孝道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于对养亲、不辱亲、尊亲以及谏亲思想的

^① 《大戴礼记》虽然成书于汉代,但学界一般将其作为研究早期儒家的重要资料。本文关于《大戴礼记》的理解,主要参考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本文所引关于《大戴礼记》的相关注疏,亦见此书,恕不一一作注。再,《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开篇曾子关于孝道的大段论述亦见于《礼记·祭义》,文字略有差异,如“其次不辱”为“其次弗辱”等。本文对《礼记》的理解主要参考钱玄等注译《礼记》,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版。

细化。关于养亲。在养亲问题上,曾子特别强调要及时行孝,并将及时行孝与入仕原则相联系。《韩诗外传》卷九载:

孔子行,闻哭声甚悲。孔子曰:“驱!驱!前有贤者。”至,皋鱼也。被褐拥镰,哭于道傍。孔子辟车与之言曰:“子非有丧,何哭之悲也?”皋鱼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学,游诸侯,以后吾亲,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间吾事君,失之二也;与友厚而小绝之,失之三矣。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见者,亲也。吾请从此辞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诫之,足以识矣。”于是门人辞归而养亲者十有三人。

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孝养父母要及时,不要等到父母过世后再后悔。曾子对此也有清楚的论述,《大戴礼·曾子疾病》曰:

人之生也,百岁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复者而先施焉。亲戚既殁,虽欲孝,谁为孝?老年耆艾,虽欲弟,谁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时,其此之谓与?

曾子指出,父母会年老、会有疾病、会离去,这些都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因此,孝养父母要及时;等父母辞世之后,就是想尽孝道也没有机会了。为了能够及时行孝,曾子提出了特殊的入仕原则,即父母在世,如果“家贫亲穷”,作为人子,应“不择官而仕”,以俸禄来赡养父母。曾子提出:“若夫信其志,约其亲者,非孝也。”假如一味强调自己的志向理想,不屑于低官薄禄,而让父母忍受贫穷,是不孝的表现。

关于不辱亲和尊亲。不辱亲和尊亲,其实都是指精神层面的孝。“不辱亲”是指孝子不要让父母因为自己而受辱,也包括不让父母担惊受怕。“尊亲”,一则指孝子对父母的敬爱尊重,再则有显亲扬名、使父母以子为荣的意思,亦即“荣亲”。曾子孝道思想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求孝子谨言慎行、爱惜自己的身体和荣誉,从而免除父母的担忧,并让父母引以为荣:

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痹亦弗凭;不苟笑,不苟訾,隐不命,临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大戴礼·曾子本孝》

孝子恶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兴焉,故恶言不出于口,烦言不及于己。——《大戴礼·曾子本孝》

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涂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大戴礼·曾子本孝》

故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举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己,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则可谓孝矣。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大戴礼·曾子大孝》

君子之所谓孝者,国人皆称愿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谓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久,为难。久,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大戴礼·曾子大孝》

曾子不厌其烦地指出,为了不使父母担忧,不使父母受拖累,作子女的,一言一行、一

举手一投足,都要慎之又慎。否则,伤了身体,就是伤了“父母之遗体”,是不孝;惹来麻烦和耻辱,让父母担忧并连带受辱,更是不孝。反之,孝子要做到庄、忠、敬、信、勇,这样,父母就会因为拥有德行完美的儿子而成为天下人艳羡的对象。曾子这一系列关于贵体全生的论述,可以说是对孔子“守身为孝”观念的具体化和细致化表述,也是《孝经》中所提出的、影响至为深远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的直接来源。

曾子强调,真正的孝子,不止要养亲,更难得的是尊亲、敬亲;不止是偶尔尊亲、敬亲,而是要持之以恒地尊亲、敬亲,因此,不止在父母生前要尊亲、荣亲,而且要在父母去世之后,仍然谨言慎行,不使父母的名声受损。曾子还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广孝”思想,提出“尊亲”不光只是尊父母,还要尊父母的朋友。“尊亲”不光只是自己“尊”亲,还要让自己朋友一起来“尊”。

关于谏亲。曾子直接继承孔子的谏亲思想,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几谏”之道。《大戴礼·曾子本孝》云:“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故孝子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死则哀以莅之,以敬如此,而成于孝子也”;《大戴礼·曾子大孝》云:“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谓礼终矣。”这样,曾子既明确提出孝子事亲应该“以正致谏”、“义以辅之”,又强调谏亲的原则是“谏而不逆”,即要做到孔子所说的“无违”。对于“不逆”?曾子有具体的论述,大意为:作儿子的劝谏父母,要委婉,要诚心诚意,要让父母欢喜无忧。父母从谏,要主动承担过错;父母不从谏,则要站在父母的立场,为父母辩解,并为自己误会父母、使父母受委屈而道歉。总之,不能让父母不高兴、受委屈。(《大戴礼·曾子立孝》)

综上所述,曾子直接继承了孔子的孝道思想而又多有发挥。

四 孟子和荀子的孝道思想

作为儒家新一代代表人物,孟子与孔子、曾子一样重视孝道,同时,又提出了某些有异于孔子、曾子的孝道原则。具体来看,孟子的孝道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守身为事亲之本。《孟子·离娄上》将“事亲”、“从兄”视为仁义的本质:“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接下来,又指出事亲的根本则在于“守身”: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闻之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孟子直接继承了孔子及曾子“守身为孝”、“全生为孝”的思想,先提出“事亲为大”、“守身为大”的原则,再进一步指出,守身才能事亲。第二段引文中,“五不孝”中的第四、第五两条即属于不守身的具体表现:放纵欲望以至犯罪、逞血气之勇与人斗殴,这样就会连累父母遭受耻辱甚至刑戮。

第二,传宗接代为孝。《孟子·离娄上》云:“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按照礼法规定,娶妻应该禀告父母,而舜则在没有禀

告父母的情况下娶了尧的两个女儿。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稟告而其父不允许的话,就会绝了后嗣,而绝后则是最大的不孝,所以,在明理的君子看来,舜不告而娶与稟告了是一样的。孟子在这里明确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直接将子嗣与孝道联系在一起。这一传宗接代为孝的观念对中国人的生育观影响至为深远。

第三,强调“顺亲”乃至“父子不责善”。《孟子·离娄上》云:

孟子曰:“……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

孟子在这里强调,为人子女,要能“得乎亲”并“顺乎亲”,即与父母相处融洽并顺从父母的意愿。舜的父亲瞽瞍性情顽固,多次欲置舜于死地,舜犹能极尽事亲之道,终于让父亲瞽瞍高兴起来。瞽瞍高兴,全天下人都得到了感化,从此天下的父子伦理也就得到了确定。孟子认为,像舜一样,千方百计顺从父(母)命、讨父(母)的欢心,才是真正的大孝。在《孟子·万章上》篇,孟子曾与万章讨论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即舜为什么在地里耕种时要仰天哭诉的问题。孟子说,舜之所以哭诉是因为“不顺于父母”,因为在舜看来,天下之士悦之、拥有帝尧二女之美色、富有天下、贵为天子,均不足以解忧,“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而且,舜不像一般人那样,年幼依恋父母,长大之后却只知道宠爱妻子、倾慕君王,舜到五十岁了还一如既往地依恋父母。孟子说“大孝终身慕父母”,像舜一样,顺亲而且终身慕亲,才能算是真正的大孝。据《孟子·告子下》,孔子亦曾言:“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孟子进一步提出,要真正做到“顺乎亲”,就要注意父子之间的相处之道。这样,孟子一反孔子、曾子的谏亲原则,提出了“父子不责善”的原则。《孟子·离娄下》载: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如果说舜是“得乎亲”、“顺乎亲”的正面典型,章子则是不得乎亲、不顺乎亲的反面典型。据说匡章的母亲触犯了他的父亲,其父一怒之下欲杀之,章子劝谏其父,其父不听劝阻,还是将他的母亲杀了,父子关系从此恶化。站在今天的立场,父亲杀害母亲,父亲当然有错;作儿子的谏阻父亲,亦在情理之中。奇怪的是,当时的社会竟普遍认为匡章不孝,匡章自己也是为了赎罪而赶走妻子、疏远儿子,以终身不受妻儿的侍养来惩罚自己。孟子虽然不认为匡章不孝,却从匡章家的伦理悲剧中引申出父子不则善的原则。孟子认为,以善相责,应该是朋友之间应该做的事,父子之间,如果以善相责,则会极大地伤害彼此的感情。孟子举匡章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子不应该以善责父;另一方面,孟子甚至还将父子不责善的原则运用到教子的问题上。《孟子·离娄上》载:

公孙丑曰:“君子之教子,何也?”

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孟子说,作父亲的亲自教导自己的儿子,在情势上是行不通的。因为,执教的人一定会用正道去教导学生,教育而没有效果时,执教的人就会生气,一旦生气就会伤了父子恩情。所以,古时候人们往往易子而教。父子之间不要互相拿正道理来责求对方,否则就会疏远,疏远了就很不好了。结合前面所说的“顺乎亲”,孟子强调的主要还是子不能责父。他所引的舜顺于瞽瞍的故事,被后人直接提炼出“世上无不是底父母”之教条。^①

让人困惑的是,孟子所说的“不孝有三”,除了“无后”之外,其它两不孝为“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与“家贫亲老,不为禄仕”,^②前者明确要求为人子者如果见亲不义不能阿意曲从,否则即是不孝,这里又要求父子不能相责以善,显然矛盾。再则,《孟子·告子下》亦载,孟子在与公孙丑讨论《诗经》中的《小弁》和《凯风》两首诗时,又说“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即父母过错大而无怨言,则显得与父母疏远,父母过错小却一味抱怨,说明作儿子的受不得一点刺激,两者都是不孝。这样看来,对待父母的过错,到底应该怎么做,孟子的态度还真是有点模棱两可。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据《孟子·告子下》载,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在葵丘之会上与诸侯订立的盟约中第一条即是“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即以诛杀不孝子为第一条第一则,可见当时社会对孝道的重视程度之一斑。

荀子关于孝道的论述比较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慎终追远、强调丧葬祭祀之礼。如前所述,孔子、曾子均有“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说法(分别见《论语·为政》及《孟子·滕文公上》引),荀子继承了这一思想。而且,针对“厚其生薄其死”的观念,荀子尤其强调丧葬祭祀之礼的重要。《荀子·礼论》云:

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

丧礼之凡,变而饰,动而远,久而平。故死之为道也,不饰则恶,恶则不哀;尔则玩,玩则厌,厌则忘,忘则不敬。一朝而丧其严亲,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则嫌于禽兽矣,君子耻之。故变而饰,所以灭恶也;动而远,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优生也。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

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故丧礼者,无他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孝敬,而终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铭诔系世,敬传其名也。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

荀子反复强调丧葬祭祀之礼的重要,强调不管父母是生是死、有知还是无知,子女都应该敬事如一,否则无异于奸人甚至无别于禽兽。儒家向来有重视丧葬祭祀的传统,《礼

① 《四书章句集注》之《孟子集注》卷7引罗仲素语。

② 《孟子集解》引赵氏语:“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记·祭统》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者，教之本也”；《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至于荀子特别强调“事亡如存”，应该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孔子之后，荀子之前，有墨家的薄葬观念流行，所以，荀子才会针对“薄其死”的观念立论。

第二，荀子孝道思想的另一大特色是，明确将孔子、曾子的谏亲思想提升为“从义不从父”的理性法则。《荀子·子道》云：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命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

紧接此段，即是鲁哀公问孔子“孝与从父命”之间的关系的那段话，可见，荀子在此是非常自觉地对孔子“父有争子，不行无礼”观点进行引申、发挥。在这里，荀子对人的德行进行了层次划分：一般意义上的孝悌，只是最低层次的德行，顺从君父、笃爱卑幼是中等层次的德行，只有做到服从道义而不盲目服从君父才是最高层次的德行。接下来，荀子还具体说明了孝子不应该从父命的三种情况，并强调指出，只有知道什么该从什么不该从，才能称得上“大孝”。此段结尾部分所提出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之论应该是中国传统忠孝思想中最具理性光芒的精华，荀子虽然说是引自“传”文，但不见于其他典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荀子本人的思想。

综上所述，中国原始文明中即有“养老”、“尚齿”的传统，自商周至春秋时期，祭祀、守丧等孝行以及敬亲顺亲、事亲养亲、敬祖报本等孝道观念已经流行于社会。在原始养老、尚齿的传统以及商周孝道观念的基础上，先秦诸子均就孝观念展开了论述，而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儒家的孝道观念。即使同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曾子、孟子的孝道观亦同中有异，显示出多元性内涵，有至今仍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富有人文精神的正面质素，也有需要反思、批判、抛弃的糟粕。

概括来看，虽然孔子已隐约有忠孝相通的观念，但是，先秦儒家孝道观念的核心内容是孝亲，属于家庭伦理。历来被视为儒家孝道思想之集大成者的《孝经》，标志着儒家孝道由家庭伦理向政治理论的关键性转变。^①秦汉以后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提倡的《孝经》之“孝”，其实与原始儒家的孝道思想已经有了不小的距离。

（作者通讯地址：段江丽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100083）

（责任编辑 晓 思）

^① 段江丽《从家庭伦理到政治伦理——〈孝经〉在儒家孝道思想史上的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第3期。